

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合作共赢加快“走出去”步伐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电影对外合作交流回望

■文/本报记者 赵丽



《建国大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正所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中国电影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将中国文化推广传播到海外具有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电影与世界各国电影人开展了广泛合作,共同拍摄了如《风筝》、《风从东方来》、《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末代皇帝》、《太阳帝国》、《英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功夫梦》、《唐山大地震》、《建军大业》、《狼图腾》、《长城》、《湄公河行动》、《时间去哪儿了》、《红海行动》等一批优秀作品。合作方式也从“借船出海”、“联合造船”,逐渐走向了掌握话语权的“自主驰骋、扬帆远航”。

70年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不断繁荣发展,向国际的推广输出步伐也不断加快。在此过程中,通过“合拍片”的方式“走出去”,明确了中国电影是以中国视角看待人类共通性问题,如亲情、爱情、全球环境、科技对人类的影响、城市化问题等,在国际电影市场上树立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 合拍片为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外合拍对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中外友谊起到了积极作用,纪录片是这一阶段对外合作的主要类型。早在1949年9月,中国就与前苏联开始了纪录片的联合摄制。当时,两国的制片单位合作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1950年,两国又合作拍摄了《中国杂技团》、《长江大桥》。

其中,《解放了的中国》摄制完成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并讲话,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影片的中苏两国工作人员表示深切谢意。

1952年,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八一电影制片厂)与捷克斯洛伐克陆军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纪录片《人民心一条》,两年后,又与捷军队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纪录片《通往幸福的道路》和《友谊花朵处处开》。这两部影片分别介绍了康藏青藏公路,以及总政歌舞团访问捷克。还是在1954年,解放军电影制片厂与保加利亚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展现保加利亚歌舞团访华的《载歌载舞访中国》。

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朗斯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故事片《风筝》,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中外合作的故事片。影片讲述了法国男孩比埃罗通过

一只漂洋过海而来的风筝与中国的小朋友结下友谊的故事。

《风筝》之后,1959年,中国与当时的前苏联联合拍摄了彩色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合作的作品,是中苏首次合作的故事片,通过一种新的视角,展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同时也讴歌了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这一阶段的合拍片,主要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人民的和平友谊,突出文化交流的作用,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例如《风从东方来》,被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片。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

的影片《中华女儿》,也是在捷克斯洛伐克,1950年,这部由凌子风执导的抗日题材影片,获得了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

参加这届电影节还有故事片《赵一曼》和《百万雄师下江南》等五部纪录片,《赵一曼》女主角石联星获演员奖,五部纪录片获荣誉奖状。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电影代表团和选送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此后的几年中,中国电影《钢铁战士》、《白毛女》、《风筝》、《人民的战士》等影片都在该电影节上有所斩获。

还是1950年,“人民民主国家电影节”在北京举办,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

波兰、朝鲜、越南等国的电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举办外国电影的盛会,对加强我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和友谊,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7年8月-9月,我国首次举办“亚洲电影周”,16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代表团来到中国,周恩来总理以及贺龙、陈毅、郭沫若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和招待会。电影周在十个城市放映了各国参加电影周的影片,举办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不仅“请进来”,还要“走出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电影人携优秀中国影片远赴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罗

马尼亚、印度、瑞士、法国、南斯拉夫等国,与当地电影人交流,《解放了的中国》、《白毛女》、《中华女儿》、《林则徐》、《梁山伯与祝英台》、《老兵新传》、《宝莲灯》、《风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五朵金花》、《欢天喜地》、《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神笔》、《山间铃响马帮来》等优秀影片都在海外进行了放映,获得了观众的赞许,中国电影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特有的风采。

在人才交流层面,中国先后派出多批电影考察团,赴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全面学习电影艺术、技术和管理。

◎ 改革开放助力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日本合作拍摄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中外合拍电影。随后,中日又联合摄制了故事片《敦煌》,中国意大利合作拍摄《马可·波罗》,并协助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在中国拍摄了奥斯卡获奖影片《末代皇帝》,协助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摄《太阳帝国》,与加拿大合作拍摄了《白求恩》等影片,拉开了中外电影合作拍片的序幕。

合拍片的逐渐繁荣发展,要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对外文化交流蓬勃开展。1979年8月7日,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正式成立,成立后与境外第一部与境外合拍的作品是中美合

拍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之行》,讲述、介绍、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播出后引起了巨大轰动,美国人民看到了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合拍公司成立仅一年的时间,便接到了是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华拍片申请213起,合拍形势呈现出喜人的局面。例如1982年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国著名演员孙道临出任主角,影片于1982年8月29日中日建交十周年之际,在两国同时放映。该片在日本被评为1982年度十部最佳影片之一,在中国获得了政府特别奖。

同年,合拍公司与香港新昆仑影业共同投资拍摄了两部描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王朝没落宫廷生活的大型历史

故事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并于次年在内地、香港、澳门先后公映。两部影片均获得1983年度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

借改革开放之东风,中国电影与欧美国家的合拍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长足发展。例如1984年,合拍公司和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意大利想象影业、英国杨科电影公司签订了《末代皇帝》的拍摄协议,投资2000多万美元。据统计,1987年影片上映后,各国人士都被影片吸引,1988年中国境外旅游者人数较往年增加了三分之一。

1987年,著名导演史丹芬·斯皮尔伯格来到中国,拍摄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故事片《太阳帝国》,这是美国大电影

公司首次在中国拍片,上海电影制片厂协助拍摄。随后几年中,八一厂与加拿大籍电影公司合拍了《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合拍公司与日本、香港的电影公司合拍了《秦俑》、《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北影厂与香港公司拍摄了《霸王别姬》。内地香港合拍片《变脸》、中日合拍《荆轲刺秦王》、中美合拍《西洋镜》等作品也在90年代拍摄并推出。

随着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在2000年对合拍公司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合拍公司专门从事对中外合拍片的管理、协调、服务工作。从成立到改组的20年时间,合拍公司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完成故事片、

纪录片的拍摄共计1000余部。

也是改革开放到20世纪尾声这一阶段,中国电影开始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中国电影海外放映和获奖进入到爆发期和高潮期。

据统计,1978年-1989年期间,我国共派出电影代表团(组)614批,2100多人次;接待外国电影代表团(组)252批,1000余人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共计589个;送出影片1500多部次,其中故事片781部次;共获得奖项近250个。

从时间上看,最早进入北美商业院线并取得票房佳绩的中国电影是张艺谋的《菊豆》(1991年3月)。整个90年代,进入北美的12部华语影片全部是类似于《菊豆》的艺术片或历史剧情片,如《大

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等。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第四代和第五代创作的“民俗电影”是海外获奖的主要类型。所谓“民俗电影”是指自1984年陈凯歌的《黄土地》、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国际上获奖后,中国中青年导演所开创的一种影片模式。这种影片模式一直延续到1996年,该年度吴天明凭借《变脸》在第九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导演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反映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的影片逐渐增加,这些影片往往聚焦于城镇底层普通人的生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

(下转第4版)

